

献给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邓小平著作 学习大辞典

主编 迟福林 张占斌

〔晋〕新登字4号

邓小平著作学习大辞典

《邓小平著作学习大辞典》编委会

*

山西经济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54 字数:2600 千字

1992年8月第1版 1992年8月济南第1次印刷

印数:1—35000册

*

ISBN 7—80577—344—0

F·344 定价:48.80元

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旗帜下(代序)

——读邓小平著作的笔记

龚育之

(一) 写在前面

我这个报告,是一篇读书报告,主要通过摘录原著的重要论点、论述,来介绍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为便于读者查阅并表明我的介绍是有根有据的,所引的论述一一交代了出处。我所作的编排,特别是我所作的评论,是否恰当,欢迎同志们批评指正。

在进入正题之前,先讲几点看法:

学习邓小平著作的必要性 中国人学习马克思主义,必须把学习马列基本著作、学习毛泽东基本著作同学习邓小平基本著作结合起来。第一部分学习是弄清本源,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由来;第二部分学习是结合中国,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科学成果;第三部分学习是面向当代,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新发展。学习不可能也不需要读很多书,三部分著作都要精选。但是三部分都不可缺,尤其是第三部分,不能把它看轻了,挤得没有位置。

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时代、随着各国革命和建设发展而不断发展的科学。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我们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正是因为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有用,没有过时。同时我很赞成这样的看法:从马克思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发展马克思主义?需要搞清楚。绝不能要求马克思解决他去世之后成百年,两百年,成千年所产生的

问题。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他不在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出现的事情,不能要求他解决这些问题。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发扬马列主义。列宁之所以是一个真正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在于他不是从书本里,而是从实际、逻辑、哲学思想、共产主义理想上,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干成了十月革命。中国伟大的马列主义者毛泽东,并不是在马列主义书本里寻求在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途径。马克思能预料到在一个落后的俄国实现十月革命吗?列宁能预料到中国会用农村包围城市夺取胜利吗?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

所以,邓小平同志说:“世界的形势,包括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不用新的思想观点来继承、发展马列主义,就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1989年5月17日人民日报报道)

邓小平的科学著作,就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用新的思想观点来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的著作。十三届五中全会公报在宣布同意邓小平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时强调指出:“邓小平同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提出的一系列观点和理论,特别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全会要求全党一定要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的著作,使它今后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进程中发挥重大的指导作用。”

最近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谈话,针对当前的形势,论述了进一步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关键问题,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发展。这篇谈话的许多基本观点,是邓小平同志的一贯的思想,曾经反复论述过,现在针对新的情况又有新的发挥,还有许多则是新提出的论断和观点。系统了解一下十几年来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对于我们学习南巡谈话,是会有帮助的。

邓小平著作出版情况 主要有三本书:

(1)《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1983年人民出版社);

(2)《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1987年人民出版社);

(3)《邓小平重要谈话(一九八七年二月——七月)》(1987年人民出版社)。

下面引用邓小平的论述在注明出处时,分别用(1)、(2)、(3)代表这三本书。

邓小平曾经说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拨乱反正,二是全面改革。”((2)第120页)前一本书的内容,可以说主要是围绕着拨乱反正,后两本书的内容,可以说主要是围绕着全面改革。后两本书(主要文章)的外文译本,书名为《当代中国的基本问题》。

除这三本外,还有散见于报刊、党的文献集(如《十二大以来》、《十三大以来》,1986、1991年人民出版社)和邓小平专题论集(如《邓小平同志论教育》,1990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文章和报道。再有就是《邓小平文选(一九三八——一九六五年)》(1989年人民出版社)。

许多没有收入文集的报道,包含有重要的论述,不可以忽视,下面引用的时候注明了报道的日期。

如果能够快一点把《邓小平文选(一九八二——一九九二年)》编辑出版,而且编得尽可能完备一些,不遗漏重要的东西,该多好啊。这是许多读者的迫切愿望。

邓小平和毛泽东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同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之间,有三重关系:一是继承,二是纠正,三是开拓和发展。

邓小平提出的我们党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第四项就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主持制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最核心的一条”,就是“确定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1)第255页)被中国革命实践证明为科学原理的毛泽东思想,包括毛泽东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所积累的一切积极的思想成果,今天都必须继承和坚持。没有这个继承的关系,就否定和割断了历史,就会丧失我们的基本立足点,就会迷失前进的方向。

而坚持毛泽东思想,是以把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同志晚年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1)第261页)区别开来为前提的。没有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主要是“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这一重关系,就没有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伟大的历史转折”,也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

邓小平给“拨乱反正”下的定义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1）第264页）继承和纠正这两重关系的综合，也就是拨乱反正。

还必须有三重关系：面对新情况，研究新问题，发展新理论，开拓新局面。全面改革，属于第三重关系。没有这第三重关系，也没有“伟大的历史转折”和历史新时期。

邓小平在指导起草《历史决议》时说过：“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1）第264页）

邓小平同美国记者华莱士谈话，说到“文化大革命”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善于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提出改革措施，从政治上、经济上改变我们的面貌，这样坏事就变成了好事。而当华莱士强调现在领导人的主张“同毛泽东的主张都不一样”时，邓小平回答说：“有些不一样，但有些原则还是一样的。”同时他同意华莱士关于中国在进行一场新的革命的观点，说：“我们也讲现在我们搞的实质上是一场革命。”（1986年9月14日新华社讯）

邓小平这些话正好说明了上述的三重关系。

邓小平和中央领导集体 《历史决议》在论述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时指出：“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这里讲的是毛泽东同以他为核心的那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之间的关系。对于邓小平同以他为核心的那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之间的关系，同样应该这样看待。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中央领导集体总结全党全民集体奋斗的实践经验的结果。其中的许多观点都是邓小平首先提出和科学阐发的；有些观点是党中央文件和党中央领导集体中其他同志首先提出和阐发，也是得到邓小平首肯和支持的。当我们说“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时候，指的就是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二)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

十三大报告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的过程中，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发挥和发展了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这些观点，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初步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基本问题，规划了我们前进的科学轨道。”报告列举了十二个理论观点。头三个是：

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

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国情，走自己的路的观点；

关于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有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的观点。

论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不能不讲这三个基本观点。它们是这个理论的前提和基础。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拨乱反正，从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开始。纠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恢复和发展毛泽东从《反对本本主义》到延安整风所确立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起点，也是这个理论的逻辑起点。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所作的一个中国化了的重要概括。毛泽东用这个思想从哲学上武装了全党，使我们党摆脱了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历史决议》）的束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后来有一段时间这个基本观点在相当程度上被抛开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句句是真理”更是走到这个观点的反面。“两个凡是”则是仍未能摆脱这种个人迷信的思想樊笼的产物。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领导和支持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1)第133页）邓小平反复强调“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1)第64页）、“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1)第121页）、“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1)第109页），并且明确地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确定为我们党的根本的思想路线，这样就从哲学上重新武装了全党，使我们党从“两个凡是”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这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

什么叫解放思想？邓小平解释说：“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1)第243页）“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1)第131页）

拨乱反正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全面改革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整个进程，都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什么时候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不讲了，什么时候我们的事业就会停滞。

最近邓小平在上海表示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1992年3月11日解放日报讯）这当然也是对全国人民的希望。“思想更解放一点”，是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的前提和先导。

“走自己的道路”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同群众路线，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有密切的关系。把这三点概括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的新的解释和阐发。社会主义运动，作为有共同远大理想的相互支持相互影响的运动，是统一的世界的运动。但是世界发展是不平衡的，各国的历史、经济、政治、文化背景是不一样的。各国人民走向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努力，本质上是各自独立的运动。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从本国的实际出发，依靠本国的人民群众，寻找自己的道路。统一的模式和统一的指导中心，是不能有的。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胜利，来源于从中国实际出发，找到了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邓

小平领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开始找到了中国自己的道路。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就已讲到:“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1)第149、150页)他在十二大的庄严讲台上更加鲜明地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是邓小平最先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句名言的场合。紧接着邓小平又说:“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1)第372页)

邓小平还说:“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第52页)

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中国建设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不以别国模式为社会主义范本,因而不同别国的社会主义模式共命运,我们走自己的道路。我们的命运由我们自己来掌握,由我们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就和我们自己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来掌握。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走自己的路,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政治基础。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基础的组成部分。不是说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吗?“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判断,就是从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阶段这个根本问题上对当代中国基本国情所作出的科学判断。它是我们在这个历史阶段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所应当依据的实际基础。

最先作出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是在邓小平主持制定的《历史决议》中。十二大报告和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都对这个论断有所论述。十三大报告以这个科学判断作为立论的基础,是报告了邓小平的。

邓小平批道：“这个设计好。”（《十二大以来》第1307页）十三大闭幕后，邓小平同日本社会党土井多贺子谈话，说到十三大的特点之一，是“阐述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坚定地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1987年11月17日人民日报报道）。后来，在同埃塞俄比亚总统门格图斯谈到中国过去建设社会主义中“左”的教训时，又总括地说：“当时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1988年6月22日新华社讯）

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能离开现在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离开特定的国家来谈社会主义一般原则，离开特定的历史阶段来谈社会主义一般原则，容易流入空想，为固定的“模式”框死。提出“中国特色”，提出“初级阶段”，开启了不是从外国模式、一般原则或主观空想出发而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来创造性地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大门。

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至少上百年的很长的历史阶段。邓小平提出的分三步走的奋斗目标：第一步从1980年到1990年基本解决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0年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第三步到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1986年春季以前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规划了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经济建设和发展的战略步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立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一条至少要实行到下世纪中叶的基本路线。正如邓小平最近谈话中所强调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1992年3月30日新华社讯）

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经受检验和不断丰富发展。它的提出，总结了新中国建立以来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的基本经验，否定了盲目追求“纯粹的”“高级的”社会主义、认为很快将要进入共产主义的空想，实事求是地规定了当前和今后很长的历史阶段中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任务。可以说，它是新民主主义论在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的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在寻找中国自己的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时候，指出中国国情（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大国）决定了中国不能一步走到社会主义，必须分两步走，先经过新民主主义然后才能进到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还要有一个相当长的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1953年宣布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认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周恩来曾作过这样的论述：“过渡时

期就是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就是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期,也就是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比重中逐步增长的时期。”(见《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六章第四节所引)这个时期最初设想大约要十八年,后来过于急促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被缩短为七年。过渡到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当时没有能够很好地从中国实际出发来探索,反而接受了苏联模式的相当影响,这成为后来“左”的错误的一个由来。经历过曲折,总结了教训,我们党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建设(即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几个依次连接的发展阶段,显示了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特色。

(三)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结构

这个理论的内容是多方面的,需要形成一个框架结构。这是一个有待研究和讨论的课题,会有不同意见和不同设计。各种设计可能各有短长。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个概括,我认为既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公式,也为概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提供了一个框架结构。这个公式是不是邓小平自己的概括?它是十三大的概括,也是邓小平的概括。无论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是改革开放,还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都是邓小平最先提出和反复论述的。不仅如此,十三大前夕,邓小平作出这样的概括:“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基本路线。要搞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兴旺发达起来,第一,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第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3)第42—43页》)。十三大的概括就是由此而来的。

1989年风波之后,邓小平一再说:要继续坚持十三大确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战略布局。十三大报告不是赵紫阳一个人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直讲的,只是十三大用这个语言把它概括起来。在南巡谈话中又一次强调:“要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1992年3月30日新华社讯)

(四)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最重要的决策,就是要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政治路线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为使全党全国人民从思想理论的高度认识工作中心转移的必要和意义,邓小平提出和论述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观点:

“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 在确定工作中心转移的时候,邓小平指出:“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一句话,就是搞现代化建设。”((1)第148页)“同心同德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决定祖国命运的千秋大业。”((1)第180—181页)这里不单纯是在实际工作中确定中心任务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对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解问题。邓小平反复说明:“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我们讲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含义是什么?就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就要求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所以,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体现在它的生产力要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高一些,更快一些。”((2)第52—53页)“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的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2)第115—116页)。在经济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建设,这一点尤其尖锐。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 这是针对着“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的谬论提出来的,也是总结这方面长期失误的教训提出来的,同样涉及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怎么搞社会主义的问题,跟社会主义根本任务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邓小平说:“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的,它就站不住。”((1)第176页)“从1958年到1978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2)第104页)“多少年我

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2)第120页）“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大大发展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现在我们正在向这个路上走。”（(3)第22—23页）邓小平用这样的话来警醒我们尽最大努力改变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这是坚持对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解的重大贡献。

“扭住”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环节不放松” 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要在实际工作中牢牢把握住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任务。邓小平说：“现在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我们全党全民要把这个雄心壮志牢固地树立起来，扭着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1)第213页）“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过去二十多年，我们在这方面的教训太沉痛了。”（(1)第214页）“这件事情，任何时候都不要受干扰，必须坚定不移地、一心一意地干下去。”（(1)第240页）“我们的政治路线是把四化建设作为重点，坚持发展生产力，始终扭住这个根本环节不放松，除非打起世界大战。即使打世界战争，打完了还搞建设。”（(2)第54页）

这些话，既是对过去经验教训的总结，又是为那时以后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预先定好基本的对策。这样的觉悟和决心，在最近几年国内外复杂局势中，对我们的事业发挥了强有力的稳定和指导作用。

“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 中心任务联系着主要矛盾。邓小平说：“至于什么是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也就是目前时期全党和全国人民所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或中心任务，由于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实际上已经解决了。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1)第168页）把确定中心任务同确认主要矛盾统一起来，有重要的理论和方法意义。

1956年八大一次会议在确认主要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

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和确定中心任务(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来解决这个主要矛盾)的问题上是统一的;由于未能顶住随后出现的国内外一些事件的干扰,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主要矛盾的提法,认为阶级斗争仍然是国内主要矛盾,却又讲工作重心要转移到技术革命上来。这种不一致不可能长期维持,终于导致“以阶级斗争为纲”冲掉了经济建设为中心。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新的基础上,恢复了确定中心任务和确认主要矛盾的统一。近两三年,国内外发生了更严重的事件,我们党冷静地正确地估量形势,不受干扰,仍然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仍然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关于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不动摇(十三届八中全会公报重申了《历史决议》和党章确认的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证明我们党比八大的时候成熟了。

“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 这就是生产力标准。根本任务联系着根本标准。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1)第123页)“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利还是有害,应该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1)第181页)

根据这样的精神,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写道:“全党同志在进行改革的过程中,应该紧紧把握住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基本观点,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检验一切改革得失成败的最主要标准。”十三大报告中写道:“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应当成为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

邓小平南巡谈话以后,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强调: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992年3月11日新华社讯)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说过:“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恢复并发挥了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

根本观点。生产力标准的提出和重申,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理论上的彻底性和政治上的自信心。我们坚信自己政党的政策,自己为之奋斗的新民主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归根到底能够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发展得更快更好。同时也表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决心:我们一定要作百倍的努力,作长期的奋斗,在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问题上,表现出自己的政策和制度的优越性。对生产力标准的一些简单化庸俗化误解和曲解必须澄清,但是决不能因噎废食,由此而怀疑或否定生产力标准。我们党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标准必须理直气壮地坚持。这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and 有自信心的共产党人应有的观点和态度。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在社会主义的多项任务中,把发展生产力摆在第一位,在发展生产力的任务中,把科学技术摆在第一位。邓小平 1975 年主持各条战线的整顿,指导起草《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就针对“文化大革命”中对经济和科技工作的破坏(包括对党关于科技工作的政策思想和指导理论的破坏),以马克思“生产力当然包括科学在内”的论述为依据,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后来“批邓”,《汇报提纲》被指责为“右倾翻案风”的三株大毒草之一,批判者竟然认为:“作为《汇报提纲》理论根据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所谓“唯生产力论”、“科学技术决定论”的论点;还说什么“强调科学是生产力中的首要因素,目的是为了排斥阶级斗争这个纲”。这种批判,不但反对马克思的命题,而且反对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时代潮流,完全是逆历史而动的。粉碎“四人帮”,了结了这场荒谬批判的历史公案。1977 年邓小平复出工作,立即提出“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1)第 37 页》),“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1)第 65 页》)的观点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1)第 37 页》)的要求,1978 年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重申“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并且展开论述了由此而来的一系列理论和政策观点,首先是关于我国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1)第 86 页》)的观点。这就纠正了扰乱我们多年的把社会主义中国的知识分子仍然从总体上划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错误观点,恢复了 1956 年在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和 1962 年在广州召开的科技工作会议上周恩来代表党中央确定的关于现在我国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正确观点。

1988年邓小平在同捷克总统胡萨克谈话和同中央领导同志谈话时进一步提出：“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同志论教育》第174页）这个论断，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新概括。它是从总结当代科学技术的急剧发展和对社会进步的巨大作用中提出来的，又是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登上新台阶的现实需要而提出来的。在提出这一新观点前后，邓小平还说过：发展科技和教育是我们发展战略的“第一位”（1987年11月11日新华社讯）。“从长远看，要注意教育和科技。否则，我们已经耽误了二十年，还要再耽误二十年，后果不堪设想。”（《论教育》第174页）在参观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的时候，邓小平指出：“下个世纪将是高科技的世纪。任何时候中国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1988年10月24日新华社讯）1991年4月23日还为科技界写了“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题词，要求高科技的突破带动大批新产业的发展 and 旧产业的改造。

（五）坚持改革开放

十一届三中全会在确定全党工作中心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同时，确定了对内经济搞活、对外经济开放的根本政策。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没有这个政策是不可能的。邓小平说：“中国的经济开放政策，这是我提出来的”（(2)第65页）。这里所说的经济开放，包括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对内开放就是改革。坚持改革开放，作为党的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之一，同另一个基本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相互依存的”（(3)第43页），都是围绕着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1)第151页），今后还要坚持；而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主要是改革开放政策”（(3)第33页），这是党的路线的新发展，赋予四项基本原则以新的时代内容。关于改革开放，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理论观点和政策思想：

“改革是必由之路” 邓小平说：“我们要发展生产力，对经济体制进